

## 政治参与、集体行动及欧盟私营企业的影響力\*

大卫·C·弗朗西斯

**T** 他对欧洲联盟（欧盟）中私营企业的政治参与模式进行了简要研究。使用代表性数据，允许在NUTS2区域集团（欧盟地区人口从大约80万到300万不等）的水平上进行分析，出现了各种参与模式。特别是，商业协会会员广泛存在，其变化似乎主要可以归因于跨国的模式。这种差异可能源于不同的法律制度，有些国家强制要求加入商业组织；通常，当加入会员是强制性的时，公司对这些组织提供的服务价值较低。公司也可能转向其他形式的政治参与，例如维护政治联系。总的来说，寻求影响力的政治参与模式差异很大，包括在国家内部，通常沿着可识别的制度线。使用估计的政治影响力分数来衡量这种活动。尽管这个分数会有所变化，但分析表明，分数较高的公司显示出更高的企业绩效，特别是相对于其同行/竞争对手公司。有政治竞争的证据，其中更高的影响力导致同行公司在相似活动上投入类似的精力。

### 欧盟是分析企业参与集体和政治行动的关键焦点。

私营企业参与——并且一直参与——政治活动无处不在。欧洲的私营部门也不例外。在欧洲联盟（EU）的许多国家都有深厚的历史，涉及商业协会、贸易团体和工会等组织的政治行动。普遍的解释是，集体行动团体的出现是因为其成员相对于普通人口来说集中，因此他们发现代表有利于其利益的政策进行游说是有利的，而这些成本则由公民或其他广泛当事人承担并分散，这使得他们组织并参与的可能性降低（Olson 1965）。这种私营企业的参与持续进行。实际上，鉴于政治监管和参与的多样化水平——从地方官员到国家政府，再到全面的监管结构——

在欧盟内——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多元互动可能将继续在多个复杂层面上相互作用（经济学家2021年）。

然而，尽管有长期的传统研究探讨包括企业在内的行为者如何集体参与公共物品（参见Olson 1965年的研究），以及他们如何以利用政治联系等方式进行其他形式的参与（参见Fisman (2001年)和Faccio (2006年)的早期工作，以及Bertrand等人（2018年）在欧洲的最新研究），但企业如何结合使用可用的政治参与手段尚不明确。也就是说，特别是在欧盟这样的多层面政治环境中，企业可能参与复杂级别的政治参与是合理的。企业可能会发现某些寻求政治参与的形式在某些情况下更有效，尤其是在面对同行的政治行动时。本简报利用最近的世界银行企业调查（WBES）数据，在欧盟27个国家的企业中探讨政治参与和影响模式。

\* 作者：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企业分析。联系方式：dfrancis@worldbank。致谢：本简报是关于欧盟27国区域差异和增长机会问题系列的一部分。该系列是世界银行企业分析团队（DECEA）的产品，并得到了欧盟DG REGIO董事会的慷慨支持。团队还感谢Norman V. Loayza和Jorge Rodriguez Meza对评论和指导出版过程的帮助。Nancy Morrison提供了出色的编辑协助。目标和免责声明：本系列简报中的结论并不一定代表世界银行集团、其执行董事或其所代表政府的观点。本系列的所有简报均可通过以下链接获取：<https://www.worldbank.org/en/research/brief/global-indicators-briefs-series>。

私营部门与公务人员之间的几次互动。

## 商业协会会员变化的很大一部分是由跨国差异驱动的。

政治组织在欧洲拥有漫长而多样的历史。从20世纪初以来，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时期，集体劳动和商业协会运动都获得了显著发展。然而，欧盟各国的政治制度、领导方式、政治文化和价值的多样性，有助于导致这些组织活动差异化的轨迹（马丁和斯万克，2012年）。如今，这些差异化的轨迹导致了各类商业协会在作用强度和性质方面存在不同的路径。在一些国家，比如奥地利、克罗地亚和德国，企业加入商业协会（如商会）是强制性的；成员资格可能如此自然而然，以至于很多公司对与这些组的关联只有被动了解（如果有什么了解的话）（沙克，2021年）。在这些多数国家中，商业协会的发展也延续了几百年的商务组织传统——比如行会），这至今仍在塑造政治机构和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然而，欧盟的现代超国家结构也为商业组织的活动增加了额外的层面，可以通过游说等活动在不同司法层面上施加影响力（比如地方、国家或欧盟层面的）。在这些司法管辖区范围内，不同的治理形式和水平也塑造着政府与商业关系的互动（经济学家，2021年）。

因此，企业协会会员资格是分析欧洲私营企业政治参与的自然起点。这些组织存在于所有27个欧盟国家，尽管这些组织的会员水平以及它们提供的服务的重要性和所扮演的角色差异很大。实际上，精确到51%，超过一半的欧盟27个国家的私营企业属于某种形式的商业或贸易协会（根据世界银行企业调查，WBES），包括商会和贸易协会。虽然这个数字构成了多数，无疑反映了欧洲强大的商业民间协会，但各国之间的差异很大。在七个国家（克罗地亚、荷兰、匈牙利、

奥地利、芬兰、德国和卢森堡，（这些国家）加入此类商业协会的成员比率平均超过75%。相比之下，在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立陶宛和波兰，根据WBES衡量，商业协会成员比率不到四分之一的企业（波兰的估计成员比率低于10%）。

图1展示了按NUTS2分组的企业协会会员率。该地图以颜色编码显示，从最低的（第1个五分位数，以深橙色显示）到最高的（第5个五分位数，以深蓝色显示）。该地图清楚地表明，这些比率在国家间的差异比在次国家地区间的差异更大。以德国为例，分析中使用了20个单独的NUTS2分组。企业协会会员率最低的NUTS2区域分组是上巴伐利亚（包括慕尼黑）——可能是因为拥有大量且多样化的各类企业人口。即使在上巴伐利亚，该地区的企业协会会员率总体上仍约为70%。相比之下，在波兰，企业协会会员率最高的区域分组是西波美拉尼亚，其会员率仅略低于36%。也就是说，德国最低地区的会员率几乎是波兰最高地区的两倍。还有一些国家存在显著的差异。在...之内 他们的边界。在法国，奥弗涅和卢瓦尔河地区加入率的近70%，相比之下，全国平均水平（不包括这两个地区）为44%。在意大利南部（ITC），近一半的企业属于商业协会，而该地区以外的平均水平为25%。

## 公司似乎重视由商业协会提供的服务，这取决于会员的性质。

商业协会可以向其会员提供多种服务。这些协会可以积极代表会员利益进行游说；他们也可以简单地提供有关相关法规和法规的信息，帮助建立网络（包括国际网络）并提供认证证书。从Olson的开拓性工作之后出现的文献中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是，当边际收益超过会员费用时，企业将加入集体协会。在某种程度上，当利益——例如，由于商业协会的游说而导致的有利于政策改革的政策改革——落在那些人的头上时，... 外部 协会中存在所谓的搭便车问题。通常，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为

总计近19,000次与高层管理人员进行的访谈，在疫情背景下系统地与欧盟27国的情况不同。

欧盟27国的商业协会会员率差异较大，且国家间的差异更大。

私营部门的业主（表1）。在这些国家中，调查是在完全完成之前进行的。

此次国家级地区（此由次国家级地区属于一个商业或贸易协会。

来自欧盟27国的WBES。该系列展示了许多国家在某个时间进行过调查。

《简报》是该系列的第一篇。该系列旨在展示关于COVID-19的关键发现。实际上，人均GDP的平

主要指标在选定主题上，以及在大流行期间的一些指标为€42,940，显著更高。

更深入的分析，该分析不仅探索了欧元25,324的平均值以上的数据，还包括了在各国情况。

完全如此，并为未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调查已于较早前完成。因此，仅简单地

显然，调查实施的时间安排（25.49）包括调查是否进行的指标。

这提出了一个挑战（81.10）第五五分位数（67.45）在疫情期间进行的研究将引入额外的

三种不同的方法（81.10）首先，在可能的情况下，进一步令人困惑的因素，这些因素可能与

测试被运行以检验调查响应是否在统计上与较高收入水平存在差异。然而，在一些国家

自疫情爆发后与之相比。如（即，比利时、芬兰、爱尔兰、卢森堡、以及

表1表明，荷兰、罗马尼亚、西班牙和瑞典等国的大多数国家（某些...）

在某个时段进行田野调查时，田野调查在调查前和调查期间都进行了。

世界银行集团（WBES）的数据。

来源：

世界银行企业调查（WBES）数据。

备注：

该图中的分组基于NUTS2区域，但在WBES观测稀疏时，它们偶尔会将相邻区域合并。NUTS2区域约有80万至300万居民。EU-27 = 欧盟的27个国家；NUTS = 统计用地区单位名称。

此类问题可通过提高非会员成本来解决，包括通过使协会会员资格成为强制性条件。

欧盟27国的WBES包括四个关于企业协会的活动对其成员有用程度的特定问题（这些问题只问那些报告称自己是企业协会成员的受访者）。这些服务包括：“影响监管决策...”（游说）；“政府法规信息”；“认证产品标准或质量”；以及“国际投入品和产品市场联系信息”。图1显示了报告加入任何企业协会的企业的百分比，其中发现这些特定服务“有些”或“非常有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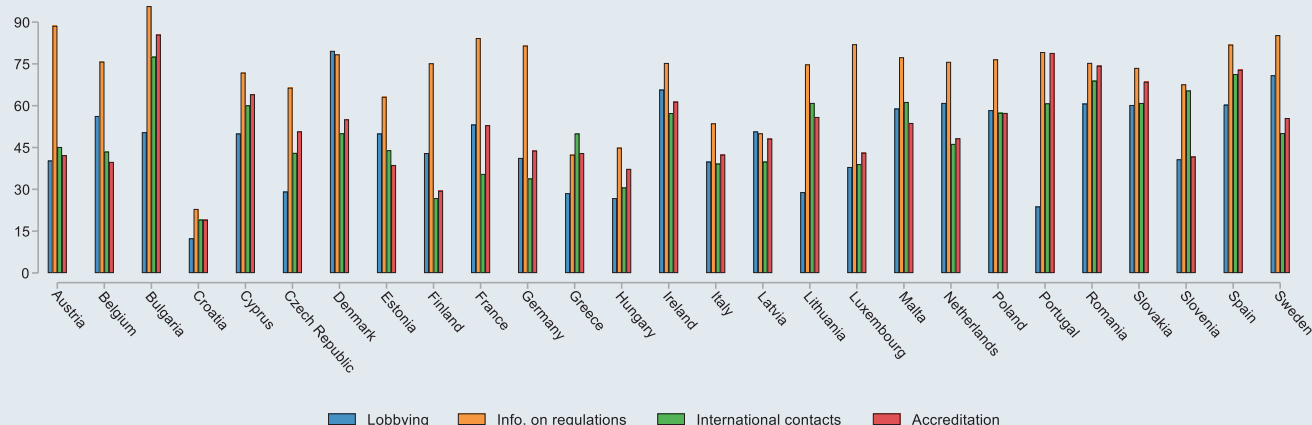
在观察此图表时，出现了一些有用的模式。这些服务通常被认为“有点”或“非常”有用。声称他们属于商业协会的公司的72%报告称，提供关于法规信息的服务是有用的（在此之后，“有用”用于公司表示评级为“有点”或“非常”有用的情形）。因此，有证据表明这些服务是有用的。

商业协会运作以促进大企业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否则，个别企业与政策制定者之间信息交流的成本可能会过高（Mause和Polk 2024）。同样，多数企业认为认证服务（53%）和发展国际网络服务（50%）是有用的；报告属于商业协会的企业中，有47%认为游说是有用的。

一些国家的模式看似是例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克罗地亚、匈牙利和希腊这三个高（如果不是几乎全民）协会成员制的国家中，大部分企业（52%）报告称无。这些列出的服务平均来说是有用的，但认为其中任何一项服务有用的数量都少得多。每个这些国家都有一种在所谓“公法”体系下的商业协会会员制度，其中商会会员资格是强制性的（Sack 2021）。欧盟27国中公法体系很普遍：12个国家（奥地利、克罗地亚、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保持这种安排（Sack 2021）。在解释WBES数据时，应该

在大多数欧盟27个国家的企业协会中，大多数企业报告称，一个  
**图1**  
 或该协会提供的更多商业服务是有用的

在商业协会成员中，报告称其公司经历增长的百分比  
 服务有些或非常有用。



来源：

原文计算基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 (WBES) 数据。

备注：

欧盟-27 = 欧洲联盟的27个国家。

请注意，尽管这些国家有强制性的会员资格要求（与“私法”或自愿成员的混合体系相对），但这些模式在数据中并不完美地反映出来。例如，尽管西班牙维持一个公法体系，通过地方商会联合会，这些商会本身是国家级商会（Chamber of Commerce）的成员，但只有39%的西班牙公司报告称他们属于商业协会。这种所谓的低比率可能是因为受访者对自己的会员资格缺乏认识，要么是因为协会的活动对他们来说不太重要，要么是因为联邦制度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成员。然而，从这个体系中得出的结论似乎也很明确：这种明显的矛盾也可能是私营企业公司对该国商业协会整体活动缺乏考虑的反映。

的确，对于四个服务（游说、法规信息、国际网络和认证）来说，在商业协会（如商会）成员资格强制性的公共法国家，成员公司报告认为这些服务有用的比例较低。除了“法规信息”之外，这一差异在统计学上（至少在10%的水平上）都是显著的。作为这一发现的补充，公共法国家的成员公司更有可能认为这四个服务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太有用。这一系列发现与奥尔森类型的模型是一致的，在该模型中，当公司有机会自愿选择加入或退出会员资格时，它们会选择加入那些他们认为有用的商业协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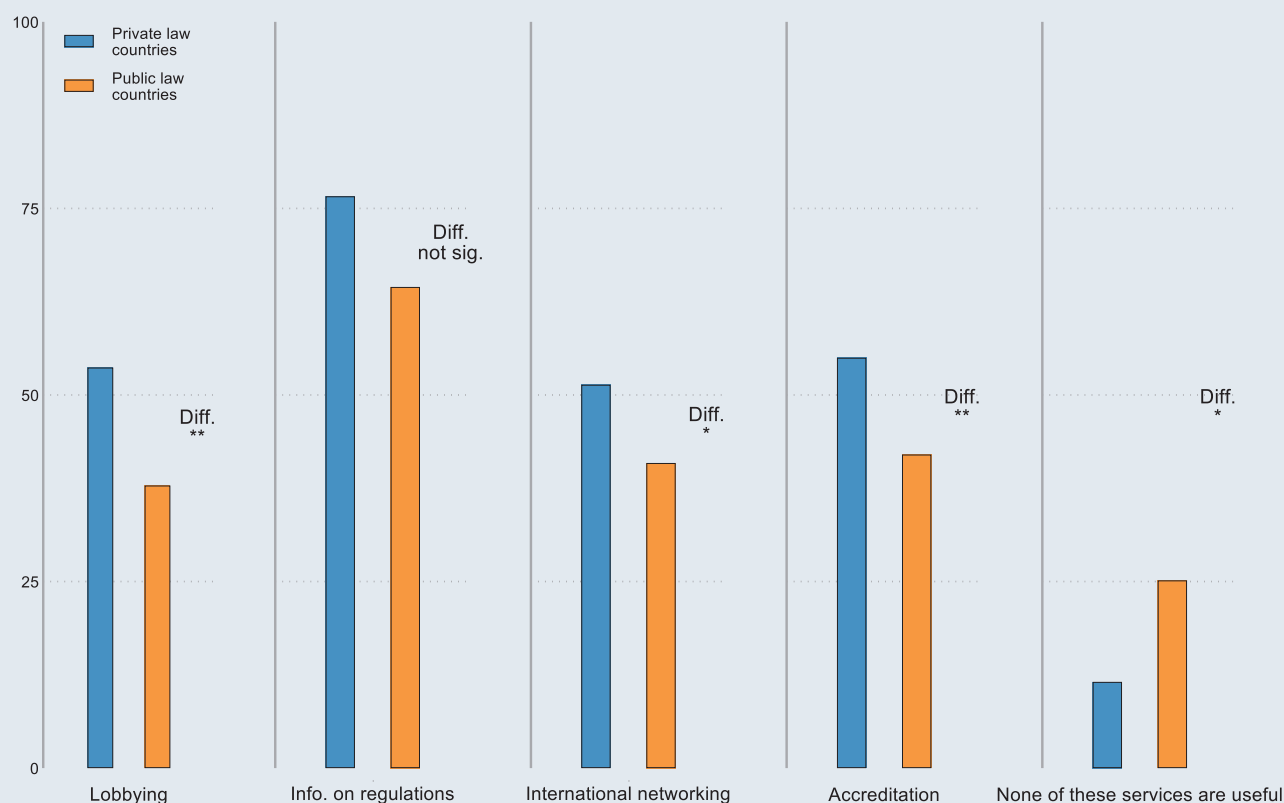
## 不同地区各种公司保持政治联系。

实际上，区分“公法”国家（这些国家要求商业协会会员资格）和所谓的“私法”制度（这里包括混合制度，其中会员资格是自愿的）可能是一个有用的视角，通过这个视角来看这些协会的好处。特别是，图2显示了在WBES中衡量到的四个服务中，企业如何考虑每个服务，比较公法国家（橙色）与私法国家（蓝色）；第五个结果展示了那些认为这四个服务都不具有实用价值的企业。

尽管在欧盟，商业协会会员资格可能是私营公司最常见的政治参与形式，但任何代表特定公司利益的集体行动也可能是间接的。因此，此类集体行动可能会遭受搭便车问题和一种委托代理问题，其中个别公司的利益可能不会被协会所代表。更简单地说，如果这些协会已经代表他们行事，公司可能不会加入商业协会——

图2

在公法体制下的公司更不太可能发现商会服务是有用的。



来源：

原文计算基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 (WBES) 数据。

备注：

每个面板中指示了差异 (“Diff.”) 的显著性水平：图中所示值为公司层面的回归估计结果，每个国家调查权重的总和等于一，使每个国家得到平等考虑。标准误差考虑了国家层面的聚类。\*\*\*  $p < .01$ ；\*\*  $p < .05$ ；\*  $p < .10$ 。

搭便车问题可能通过强制会员制来最小化——但即便如此，个别公司的利益必须与同行的利益（包括当商业协会作为组织追求自身利益时）相竞争。反过来，公司可能会寻求更直接的政治参与形式。

这种参与形式的一个显著例子是通过利用政治关系。这些联系已被广泛研究（参见Fisman 2001；Faccio 2006），研究通常显示，保持某种形式政治联系的企业可以获得大量物质收益。这些利益可能涉及直接转移给关联企业，包括通过补贴和选择性地授予政府合同（Diwan，Keefer和Schiébauer 2020）。或者，通过如增加融资渠道等机制，利益也可能归属于关联企业（Khwaja和Mian 2005）——包括通过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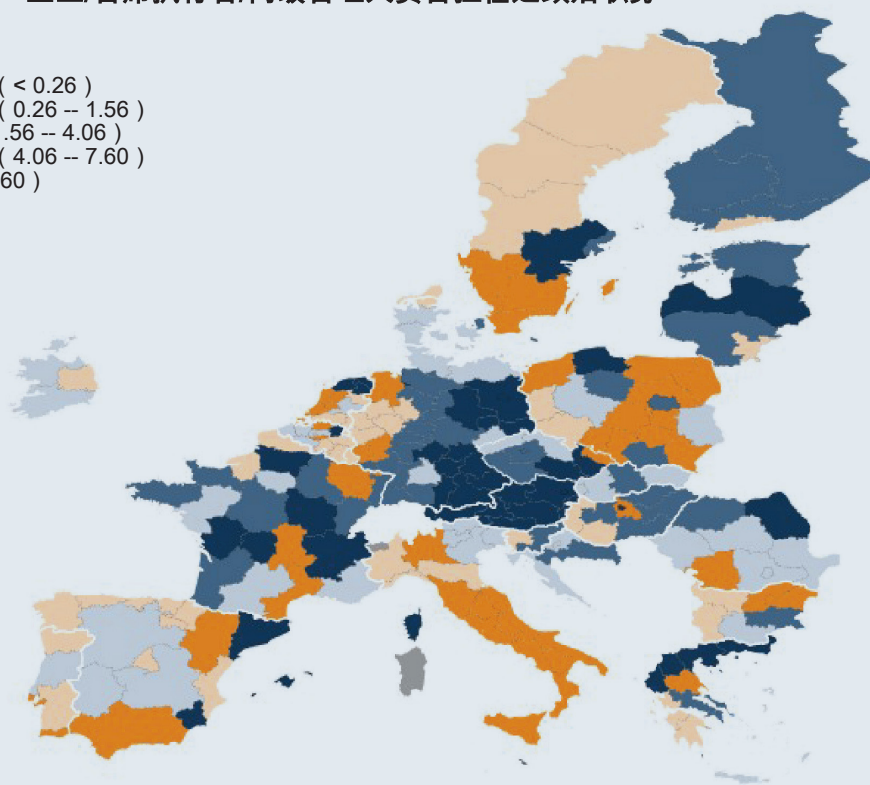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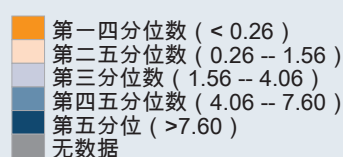
救助（Faccio, Masulis, 和 McConnell 2006）——或保护免受竞争对手的侵害（Johnson 和 Mitton 2003）。虽然关于政治联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欧洲联盟之外——例如，涵盖了马来西亚（Johnson 和 Mitton 2003）、印度尼西亚（Fisman 2001）和突尼斯（Rijkers, Freund 和 Nucifora 2017）的关联动态——最近的研究也考察了欧盟中商业-政治联系的作用（Bertrand 等人 2018；Akcigit, Baslandze 和 Lotti 2023）。具体而言，欧洲民主国家可能会改变建立政治联系的成本和性质。例如，Bertrand 等人（2018）发现，法国公司通常需要过度雇佣工人作为交换，以保持当选官员的满意。

欧盟中的世界银行企业调查（WBES）包含了一个问题询问 *如果该公司的所有者、首席执行官、高级管理人员或任何董事会成员曾在此国被选举或任命担任政治职位*。虽然这个政治措施的标准

图2

私人公司政治关联的比率在欧洲各地有所不同

## 业主/首席执行官/高级管理人员曾担任过政治职务



世界银行集团 (WBES) 的数据。

来源：

世界银行企业调查 (WBES) 数据。

备注：

地图显示了27个欧盟国家 (欧盟-27) 中约有80万至300万人口的NUTS2区域。CEO = 首席执行官；NUTS = 统计用地区单位名称。

连接是不完整的，因此是不完美的（例如，它不包括家庭或社交联系），但它确实提供了一个在多个情境中可以适用的政治联系的一般可比度量。总的来说，欧盟4%的企业报告拥有此类联系，这表明这些关系远不如商业协会的成员普遍。相比之下，在一个包括许多非欧盟国家的更大样本中，Francis和Kubinec (2022) 发现这一平均水平约为5%，这表明欧盟的水平与别处没有明显差异。

图2显示了欧盟27国的政治关联率，同样根据每个NUTS2区域所在的五分位数进行着色。在一些国家，例如西班牙，拥有关联高层管理者或所有者的企业率在首都地区出人意料地最高。相比之下，在其他欧盟国家（尤其是德国、法国、奥地利、捷克共和国和波罗的海国家）中，政治关联率在大多数地区相对较高。这些差异的一个潜在原因可能是……

可能是每个国家公共部门以及其经济的基础结构。具体而言，当公共部门就业的货币吸引力不如私人部门的机会时，就存在公共部门的员工可能会被私人部门吸引的可能性。当然，衡量这种吸引力的一个指标是平均工资。以欧洲统计局提供的系列数据为例，<sup>1</sup> 可以计算出私营部门工资与公共行政工资的比例（私营部门平均中位工资按使用WBES计算的劳动力人口份额加权）。使用此方法计算出的公共行政工资与私营部门工资的平均比率为近1：0.99，涵盖23个国家；四分位距为0.92至1.09。事实上，在国家层面的简单回归（N=23）揭示了正且边际显著的关系（p=0.075）。这表明，从私营部门（如比率为0.92）的薪酬较低的情况转移到私营部门工资更具吸引力的国家（如比率为1.09）的情况，意味着1个百分点的增长。

在企业政治关联的数量中，这几乎是从4%的企业政治关联上升到5%，增长了近25%。也就是说，政治关联的普遍性是私人部门就业相对于公共部门工作的吸引力结构的函数，因此，考虑任何政治关联的潜在收益需要一些额外的调查。

在转向与某些类型政治参与（如商业协会或联系）相关的益处证据之前，值得探讨是否存在公司如何结合使用此类政治参与模式的显著模式。不同类型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充分探索（在经济文献中几乎不存在），仅有少数例外（Desai和Olofsgård 2011；Francis和Kubinec 2022）。关于此类政治参与模式如何产生的缺乏研究的一个显著原因是，没有简单直接的方式来理解公司是否将不同类型政治参与作为补充或替代品——包括在替代品的情况下，其中一种政治参与方式被用作其他方式的一种补充。

次优形式，当其他政治参与途径被关闭时。例如，如果企业无法建立有意义的政治联系，它们可能依赖于商业协会的活动。某些形式的“政治参与”，如支付、礼物或互惠交换形式的腐败，可能对企业来说是不受欢迎的；企业可能想避免行贿或进行此类交换，而其他形式的政治参与可能允许企业避免提取这些租金（Shleifer和Vishny 1993）。通过这种方式，政治联系和影响力可能成为企业避免支付贿赂需求的手段（Francis和Kubinec 2022）。

## 政治影响力也因政治和商业环境的差异而广泛不同。

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Francis和Kubinec（2022）开发了一个政治参与指数，该指数结合了私营企业与公共官员之间几种可能的相互作用（在随后的讨论中，此术语被标记为大写“Political Influence”，以表明它是一个估计的指数）。该指数不仅考虑了企业协会的成员资格、该协会游说的有用性以及政治联系，还增加了其他几种“相互作用”，例如与贿赂的经历。

（这可能是一种不受欢迎的政治参与方式）以及企业利用其规模作为衡量其公开塑造政策和相关法规能力的代理。该指数的优势在于，它允许作者考虑几条潜在的政治参与途径，并将这些行动的组合与许多由WBES衡量的商业环境措施相匹配。该指数有助于确定每个政治参与措施是充当替代品还是补充品；也就是说，这种探索性技术（针对商业环境的客观、可衡量的方面进行调整）不需要作者在需要企业行贿时，预先做出关于如何考虑政商关系与互动组合的任何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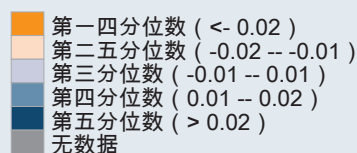
Francis和Kubinec（2022年）在他们的论文中详细讨论了这次练习的结果，尽管一些发现非常突出，值得重点强调。虽然研究发现政治联系与商业协会会员资格具有互补性，但它是腐败经历的替代品。也就是说，有联系的公司的确能够避免受贿抽取。这些公司可能也能够避免其劳动队伍规模膨胀的问题。有益的连接能够带来正面的商业环境体验，从而帮助公司避免过度招聘（Bertrand等人，2018年）。在Francis和Kubinec（2022年）原始的政治影响力估算中，包括欧盟27个国家，总共有41个国家参与了该估算，这些国家来自不同的地区。这份简报计算了剩余10个欧盟国家的指标。

图3展示了按照NUTS2区域分组计算的影响得分。该指数中很大一部分的变异是各国之间差异的结果。为了说明这种变异，在...之内 每个国家，每个NUTS2组别的得分均相对于国家平均得分进行展示：即地图显示了中心化的 指标的变化。因此，不同国家在颜色方案上的变化也展示了次国家地区的更广泛分散。以意大利、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家为例，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德国和法国。每个国家都显示出在该指标显著高和显著低的地区之间存在更高的分散。许多模式符合国家内部已知的划分。南意大利的平均政治参与活动比北意大利显著更高。德国的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区域在该指标上的值比国家的西部区域显著更高。

图3

政治影响力模式似乎遵循政治制度模式。

## 政治影响力（以国家为中心）



世界银行集团 (WBES) 的数据。

来源：

原始计算基于Francis和Kubinec (2022) 的研究，并参考了世界银行企业调查 (WBES) 数据。

备注：

地图显示了欧盟27个国家的NUTS2区域，这些区域的人口约为80万至300万。NUTS = 统计用领土单位名称。

这种差异的解释需要一些细微差别。这些发现并不一定意味着整个商业环境的整体体验是更好

在得分较高的领域。相反，高得分意味着通过政治活动（如利用关系）的杠杆作用还有更多可获取的收益，因此股息很可能会更高。换句话说，指数值越高，与为了获得更大利益，企业常常必须参与政治的情况相一致；否则，他们不可能在商业环境中获得有益的经验。相比之下，在商业环境总体有利的情况下，exerting political influence 的边际收益较小。事实上，Francis和Kubinec (2022) 论文的一个重要发现是，按照如全球治理指标 (Kaufmann, Kraay, and Mastruzzi 2011) 等几个指标衡量的制度质量普遍较弱的地区，往往是那些从选择性政治活动中获得收益较高的地区。另一种表达这个观点的方式是，在开放、多元的政治环境中——这一特征适用于大多数地区——

欧洲——发挥影响力可能成本更高，因为这通常需要与其他利益竞争，包括当这些利益发生冲突时与公众利益的竞争 (Becker 1983)。

## 政治影响力似乎在提升公司业绩方面带来了明显的收益。

不同形式的政治活动如何与公司业绩相关？虽然无法通过对横截面WBES数据的因果解读得出结论，但我们可以估算出一些政治参与度和影响力指标的初步联系。参考本简要报告中至今所讨论的三个政治活动指标：加入商业协会、政治联系以及估计的政治影响力指数。表1展示了这些公司三种突出形式的政治活动与一些关键业绩结果之间的估计相关性：劳动生产率（由每名工人的销售额的对数来衡量）；基于收入的总要素生产率 (TFPR)；销售增长率；就业

表1 不同类型政治参与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

|               | 销售额<br>(log)           | 尺寸<br>(log)            | 劳动力生产率<br>(log)        | TFPR                     | 固定资产投资<br>(=100)     |
|---------------|------------------------|------------------------|------------------------|--------------------------|----------------------|
| a. 商业协会 (Y=1) | 0.402***<br>(0.0711)   | 0.232***<br>(0.0293)   | 0.0544*<br>(0.0314)    | 0.00148<br>(0.0207)      | 9.225***<br>(1.634)  |
| 持续            | 14.20***<br>(0.0478)   | 2.490***<br>(0.0188)   | 11.52***<br>(0.0211)   | 2.689***<br>(0.0142)     | 46.28***<br>(1.095)  |
| 观察            | 7,794                  | 18,689                 | 17,115                 | 7,067                    | 18,706               |
| R-squared     | 0.336                  | 0.135                  | 0.493                  | 0.963                    | 0.195                |
| b. 政治关联 (Y=1) | -0.152<br>(0.119)      | 0.0775<br>(0.0509)     | -0.00465<br>(0.0458)   | -0.0139<br>(0.0258)      | 9.741***<br>(3.001)  |
| 持续            | 14.44***<br>(0.0299)   | 2.608***<br>(0.0117)   | 11.55***<br>(0.0136)   | 2.681***<br>(0.00878)    | 50.77***<br>(0.661)  |
| 观察            | 7,774                  | 18,663                 | 17,081                 | 7,045                    | 18,686               |
| R-squared     | 0.328                  | 0.125                  | 0.494                  | 0.963                    | 0.189                |
| c. 政治影响<br>得分 | 0.0594***<br>(0.00245) | 0.0279***<br>(0.00121) | 0.0144***<br>(0.00130) | 0.00348***<br>(0.000722) | 0.198***<br>(0.0621) |
| 持续            | 7.921***<br>(0.265)    | -0.292**<br>(0.125)    | 10.03***<br>(0.140)    | 2.299***<br>(0.0810)     | 30.48***<br>(6.540)  |
| 观察            | 7,833                  | 18,838                 | 17,224                 | 7,096                    | 18,855               |
| R-squared     | 0.473                  | 0.200                  | 0.507                  | 0.963                    | 0.189                |

来源：

原始计算本简报所使用的指数来自Francis和Kubinec (2022年)，并借鉴了世界银行企业调查 (WBES) 数据。

备注：

估计使用调查权重重新调整，以确保每个NUTS2分组具有总计采样权重为1。标准误差稳健，允许在NUTS2区域分组与产业交叉级别上进行聚类。所有指定中都包括了NUTS2分组和产业的固定效应。规模以工人的对数来衡量。NUTS = 统计地区单元名称；TFPR = 基于收入的总要素生产率衡量指标。a. 27个欧盟国家中的NUTS2地区约有80万至300万人口。

\*\*\* p&lt;0.01；\*\* p&lt;0.05；\* p&lt;0.1

增长；以及最近在固定资产（通过二元指标衡量）上的投资。由于可能存在政治参与和产业生产力的普遍模式，因此在（ISIC两位数）产业级别上包含了所谓的固定效应。<sup>2</sup> 在NUTS2区域分组层面，这是一个固定效应。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包含此类固定效应通常被解释为抵消了独立变量（商业协会，如表1面板a所示；政治联系，如表1面板b所示；或政治影响，如表1面板c所示）和结果变量（如表1的每一列所示）中的任何共同平均值。从解释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表中的结果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参与形式与结果之间的关系。相对的 对企业的行业及其地理位置。

与更高的销售额和劳动生产率显著相关，但TFPR（图a）并未发现此类显著关系；这两项生产力的基本指标均未显示出与政治关系的关联（图b）。一些进一步的解释有助于解读这一结果。可能的情况是，政治关系并不一定在所有条件下都会带来可观察到的实质性收益，这些收益会在绩效指标中体现。此外，尽管这些关系可能会带来一些对公司有益的收益，例如更大的销售额，但这些公司可能面临着需要雇佣更多工人来安抚政治赞助者的政治条件（如Betrand等人2018年所展示），或者在这些条件下，公司可能将资源，如资本，配置得不够有效率（如Diwan、Keefer和Schiaber 2020年在欧洲以外的情况下所展示）。那些要么是商业协会成员，要么有政治关系的公司

一些有趣的结果浮出水面。首先，尽管在商业协会的会员资格是正面且

连接都更有可能报告已投资于固定资产。

转向政治影响力得分（面板c），该得分不仅考虑了企业的政治参与度，还将这些参与模式与商业环境中的经验进行校准，这一得分与销售额、规模以及生产力的两个基本指标（劳动生产率和TFPR）以及固定资产投资都显示出显著的关联。也就是说，一旦企业的政治参与度调整以考虑这些相互作用（例如，加入商业协会或建立政治联系），该指数与商业绩效关键指标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更加紧密。事实上，政治影响力指数得分较高的企业也更可能报告称，“向政治家和官员支付、赠送礼物或交换好处”至少对他们的运营有重大影响。当这个问题被提出时，这一结果依然成立。

关于议员、国家官员或地方官员（见表2）。对于商业协会的会员资格，没有发现这样的显著结果，而只有在询问关于地方官员时，才能发现政治联系和此类互动之间的显著关系。

该结果可能需要一些解析。一方面，这可能表明政治参与且有影响力的公司更有可能报告诸如支付或礼物交换等活动对其业务的影响，因为这些公司也容易受到贿赂请求；然而，当观察WBES（表2中未显示）中的其他贿赂请求措施时，并未发现任何关系。综合来看，这些结果暗示，政治影响力的公司并未因参与此类影响力而面临贿赂请求增加的几率；事实上，Francis和Kubinec（2022）的一个关键结果是，政治影响力往往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方式。劝阻贿赂请求。相反，可能的情况是这些

**表 2** 政治参与类型与公司运营影响之间的相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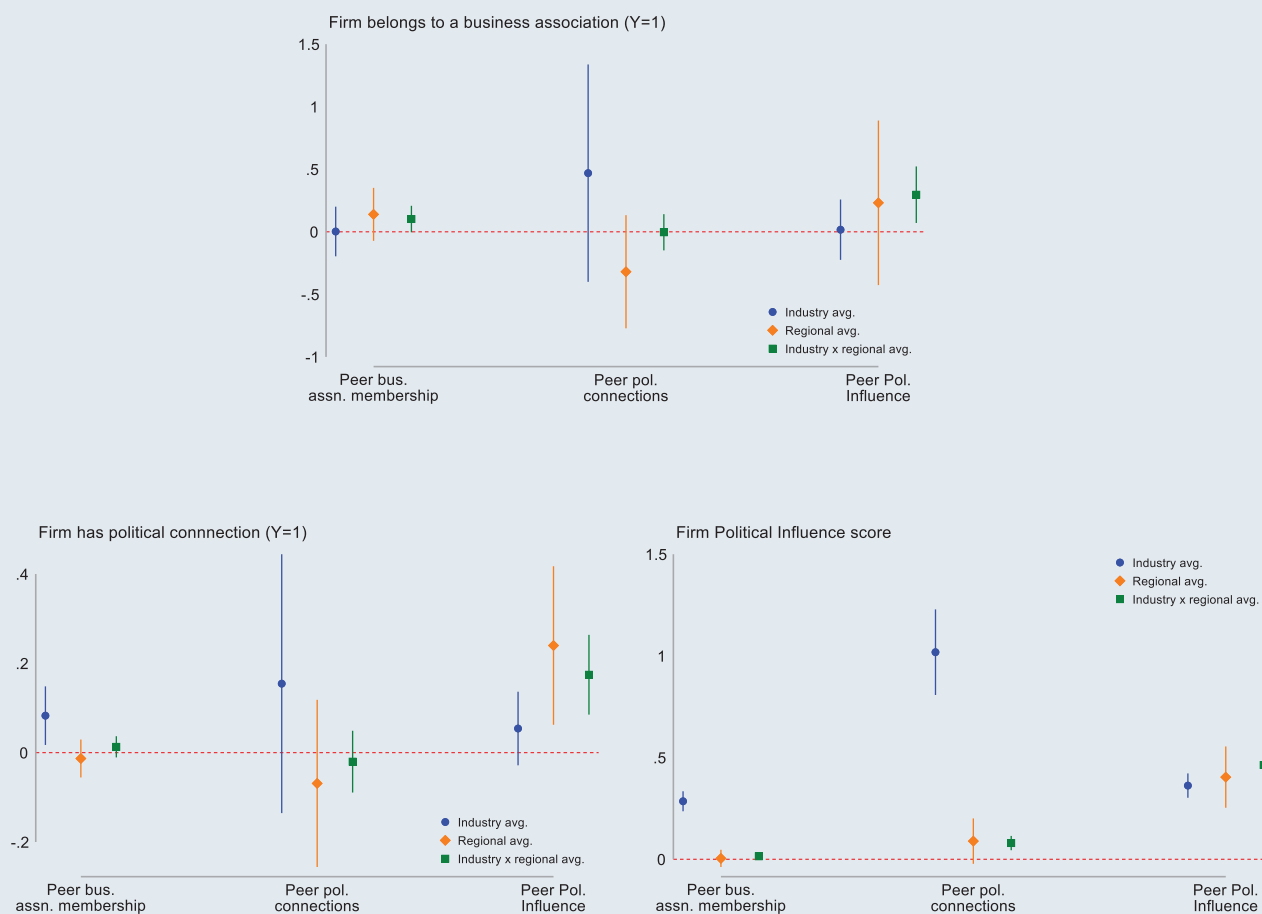
|              | 支付、礼物或利益的交换具有企业（Y=1）的重大或极其重大影响。 |                      |                       |
|--------------|---------------------------------|----------------------|-----------------------|
|              | 议会                              | 国家官员                 | 本地官员                  |
| a. 商业协会（Y=1） | 0.159<br>(0.415)                | -0.238<br>(0.435)    | -0.501<br>(0.451)     |
| 持续           | 2.528***<br>(0.291)             | 2.973***<br>(0.329)  | 2.706***<br>(0.319)   |
| 观察           | 18,778                          | 18,778               | 18,778                |
| R-squared    | 0.145                           | 0.153                | 0.126                 |
| b. 政治关联（Y=1） | 1.223<br>(0.980)                | 1.552<br>(0.989)     | 2.487**<br>(1.217)    |
| 持续           | 2.557***<br>(0.215)             | 2.799***<br>(0.240)  | 2.326***<br>(0.211)   |
| 观察           | 18,758                          | 18,758               | 18,758                |
| R-squared    | 0.145                           | 0.153                | 0.127                 |
| c. 政治影响得分    | 0.0739***<br>(0.0220)           | 0.0637**<br>(0.0247) | 0.0610***<br>(0.0230) |
| 持续           | -5.092**<br>(2.233)             | -3.777<br>(2.544)    | -3.918*<br>(2.336)    |
| 观察           | 18,936                          | 18,936               | 18,936                |
| R-squared    | 0.146                           | 0.154                | 0.127                 |

来源：原始计算此简报使用Francis和Kubinec（2022）的指数，并参考世界银行企业调查（WBES）数据。  
 注意：估计时，对调查权重进行了重新调整，以确保每个NUTS2分组的总样本权重为1。标准误差稳健，允许在NUTS2区域分组与行业交叉层面的聚类。所有模型中均包含NUTS2分组和行业的固定效应。  
 规格。尺寸以工人的对数来衡量。NUTS = 统计用地域单位名称；TFPR = 基于收入的衡量指标总的生产率。  
 a. 27个欧盟（EU）国家的NUTS2地区拥有约80万至300万人口。\*\*\* p<.01；\*\* p<.05；\* p<.1

图 3

## 同行政治参与与公司政治行动及影响力

magnitude of correlation between peers' actions and a firm's own political activity (y-axis)



来源：

原文计算本简报使用Francis和Kubinec (2022) 的指数，并参考世界银行企业调查 (WBES) 数据。

注意：

90%置信区间已显示。每个标记点代表一个单独回归中估计的相关性，该回归包括国家层面的固定效应和稳健标准误差，以调整行业-地区层面的可能相关性。所有回归均采用调查加权，每个NUTS2区域组重的总和等于1。在27个欧洲联盟国家（欧盟-27）的区域平均值为NUTS2级别。NUTS = 统计区域单位命名法；TFPR = 基于收入的总要素生产率衡量指标。注：NUTS2区域的人口约为80万至300万。

公司简单地将“互惠互利”视为政治参与的延伸。然而，这些结果另一方面也可能表明，面对这样政治交换环境的公司也需要政治参与。

尽管可能存在理由相信这两种解释都可能在发挥作用，但衡量公司是否基于一般政治环境参与政治活动的一种方法，是观察公司与其同行之间是否存在类似的政治参与行为，有助于当然，这些也可能是一些竞争对手。图3展示了这些基本关系的一些例子。这幅图包括三个部分，展示了某家公司同行/竞争对手的政治参与度之间的相关性。

公司与自身行为：这些相关性的幅度由y轴表示。同行行为显示为商业协会的平均成员数（面板a）、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平均数量（面板b）以及平均政治影响力得分（面板c）。这些平均值按行业估算（以蓝色圆形表示），按NUTS2区域分组估算（以橙色菱形表示），以及按两者的组合（行业 x 区域）估算（以绿色圆形表示）。与之前相同，同行平均值排除公司自身计算；所有估计均包括相同的公司样本（n=13,145），因此差异不是由于样本组成造成的。

一个正向的关系（即显著不同于零），因此显示如果一家公司的同业参与……

表格3

公司比竞争对手拥有更高的政治影响力时，其企业绩效的衡量指标也更高。

|                    | 销售额<br>(log)           | 尺寸<br>(log)            | 劳动力生产率<br>(log)        | TFPR                     | 固定资产投资<br>(=100)    |
|--------------------|------------------------|------------------------|------------------------|--------------------------|---------------------|
| 政治影响力<br>差异 vs. 同行 | 0.0534***<br>(0.00303) | 0.0228***<br>(0.00131) | 0.0119***<br>(0.00144) | 0.00393***<br>(0.000819) | 0.121*<br>(0.0726)  |
| 持续                 | 14.36***<br>(0.0217)   | 2.591***<br>(0.0113)   | 11.59***<br>(0.0129)   | 2.400***<br>(0.00806)    | 48.75***<br>(0.656) |
| 观察                 | 5,043                  | 13,332                 | 12,177                 | 4,551                    | 13,344              |
| R-squared          | 0.511                  | 0.211                  | 0.511                  | 0.935                    | 0.199               |

来源：

原始计算基于Francis和Kubinec (2022) 的指数，并参考了世界银行企业调查 (WBES) 数据。

注意：

估算时，对调查权重进行了调整，以便每个NUTS2分组具有总抽样权重为1。政治影响力差异通过一家公司的评分减去一个行业-地区中留出一项的单元格平均值来计算。仅包括至少有五家这种同业公司的单元格。标准误差具有稳健性，以便在NUTS2区域分组和行业交叉的水平上进行聚类。所有模型均包括NUTS2分组和行业的固定效应。规模以工人数量对数来衡量。NUTS = 统计用地区单元命名法；TFPR = 基于收入的总体生产率衡量标准。a. 27个欧盟 (EU-27) 国家的NUTS2地区约有80万至300万人。

\*\*\* p&lt;0.01；\*\* p&lt;0.05；\* p&lt;0.1

一种活动，那么该公司更有可能参与每个面板所代表的活动。在商业协会会员身份方面，通常公司竞争对手的活动与该公司加入此类协会的可能性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例外情况是，当同一行业和地理位置的公司在商业协会中时，某一公司更有可能也在商业协会中，并更广泛地施加其他形式的政治影响（如a面板中第一个和第三个绿色方块所示，其95%置信区间不包括零）。这一发现可能并不令人惊讶；如前所述，在欧盟，此类商业协会的会员身份通常是国家政策的问题，因此公司与其同行之间的差异很小。

与此相反，面板b显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证据：当一个企业的行业竞争对手（蓝色圆圈）在更广泛层面上拥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影响力时，该企业更有可能建立政治联系。这一发现体现在面板中的第三组点，代表了同行政治影响力和企业建立政治联系可能性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当特定企业在其区域（橙色菱形）和行业-区域（绿色方形）中参与政治活动时，企业更有可能建立政治联系。企业同行的政治影响力寻求似乎诱导个别企业通过使用自身的政治联系来获取进一步的竞争优势。

面板c似乎证实了这一发现：当同行业内的同行公司是商业协会成员或拥有政治关系时，公司估计在政治影响力指数上具有更高的价值。一般来说，当公司行使政治影响力时，公司本身遵循这一模式是有意义的（如图面板c的最后三个标记所示）。随之而来的一个自然问题是：如果一家公司是能够维持相对于同行的较高影响力，这在其公司业绩上是否产生了正的差异化效益？实际上，正如表格3所示的关系表明，政治影响力的回报是明显的。该表显示了以下两种关系：一方面是公司的... 差异影响（其政治影响力与同行业同地区企业的政治影响力的差异）和关键成果。事实上，这种差异与同行相比，与销售额、规模、劳动生产率、TFPR（全要素生产率）和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尽管同行的政治参与可能促使企业寻求更多的政治影响力，但一个合理的理由是，这种影响力似乎确实与广泛的业绩衡量指标密切相关。

**私营部门政治参与的复杂性可能会持续存在。**

鉴于欧洲政治机构的复杂和多样化特性，私营企业可能会继续在政治领域集体和个体行动。

过程。事实上，有证据表明此类行为正在增加（经济学家2021年）。一方面，此类集体行动并非新现象：贸易和商业协会的参与是长期的。然而，世界银行企业调查的证据显示，企业通过是否自愿加入或依法加入这些协会来高度评价其商业协会的会员资格。也就是说，维持强制会员制度的国家的企业似乎要么参与度较低，要么对这些协会的服务评价较低。

相应地，欧洲以及其他地区的许多公司可能会寻求以各种形式的政治地位。其中一种参与方式是通过利用政治联系。尽管欧洲的政治联系率并不特别低或高，但公司维持这些联系的速度差异很大。特别是，公司似乎集体寻求在政治影响力能够带来明显收益的地方产生影响，有时在制度环境较弱的地区（尽管需要更多次国家层面的分析来证明这种行为，根据当地机构）。这份简报还显示，这种寻求影响力的行为会导致同行产生类似的行动，因此，在某些公司的政治参与度较高时，很多公司的政治参与度也很可能较高且广泛。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这种集体行动的形态可能高度依赖于制度环境、公司对集体行动的价值观以及公司认为这种行动带来的积极或消极回报。

## 参考文献

Akcigit, U., S. Baslandze, 和 F. Lotti. 2023. “连接到电力：政治关联、创新与企业动态。”

《计量经济学》 91 ( 2 ) : 529–64. Becker, G. S. 1983. “A Theory of Competition among Pressure Groups for Political Influence.” 《季度经济学杂志》 第98卷 ( 3期 ) : 371–400. Bertrand, M., F. Kramarz, A. Schoar, 和 D. U001Fesmar. 2018. “U001Fe Cost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金融评论》 22 ( 3 ) : 849–76. Desai, R. M. 和 A. Olofsgård. 2011. “政治影响力成本：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级证据。”

《政治科学季刊》 6 (2): 137–78. Diwan, I., P. Keefer, and M. Schil001Bbauer. 2020. “Pyramid Capitalism: Cronyism, Regulation, and Firm Productivity in Egypt.” 《国际组织综述》 15: 211–46.

《经济学人》 ( 2021 ) 。游说者在布鲁塞尔和柏林的影响力正在增强。 <https://www.economist.com/business/2021/05/15/the-power-of-lobbyists-is-growing-in-brussels-and-berlin>

<https://www.economist.com/business/2021/05/15/the-power-of-lobbyists-is-growing-in-brussels-and-berlin>

Faccio, M. 2006.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 《美国经济评论》 96 ( 1 ) : 369–86. Faccio, M., R. W. Masulis, and J.

J. McConnell. 2006. “政治关联与企业救助。” 《金融杂志》 61 ( 6 ) : 2597–2635. Fisman, R. 2001. “估算政治关系价值。”

《美国经济评论》 91 ( 4 ) : 1095–1102. Francis, D. C. 和 R. K. Ubinec. 2022. “超越政治关联：一种测量模型方法估算41个国家的企业层面政治影响力。”政策研究论文10119，世界银行，华盛顿，DC。Johnson, S. 和 T. Mitton. 2003. “裙带关系与资本管制：来自马来西亚的证据。” 《金融经济学杂志》 67(2): 351–82. Kaufmann, D., A. Kraay, 和 M. Mastruzzi. 2011. “《全球治理指标：方法论与分析问题》。”

《海牙法治期刊》 3 (2): 220–46. Khwaja, A. I. 和 A. Mian. 2008. “追踪银行流动性冲击的影响：来自新兴市场的证据。” 《美国经济评论》 98 ( 4 ) : 1413–42. Martin, C. J. 和 D. Swank. 2012. 政治构建商业利益：协调、增长和平等 剑桥大学出版社。Mause, K. 和 A. Polk 编，2024年。政治经济学中的游说：影响力渠道及其监管。斯普林格自然出版社。奥尔森小, M. 1965. 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物品与群体理论，附新序言和附录 哈佛大学出版社。Rijkers, B., C. Freund, 和 A. Nucifora. 2017. “所有家族成员：突尼斯的国家捕获。” 《发展经济学杂志》 124 ( 一月 ) : 41–59. Sack, D. 2021. 欧洲商会 施普林格国际出版社。舒利弗, A., 和 R. W. 维什尼。1993. “腐败。” 《季度经济学杂志》 108 (3): 599–617.

## 注释

1 欧洲统计局 (earn\_ses18\_20)。2 基于收入的TFP度量 (TFPR) 在个别产业水平上估算 (通常是ISIC两位数水平)，需要为每个估算单独的生产函数。然而，使用产生的TFPR度量进行跨行业比较可能比较困难，因此当TFPR是结果时，包含产业层面的固定效应也可能适当。ISIC代表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是生产活动的国际参照分类。

企业笔记系列提供简短的研究报告，以鼓励在商业环境问题上的思想交流。这些笔记展示了政府政策与商业创造财富能力之间的关系。笔记带有作者姓名，应相应引用。本笔记中表达的研究结果、解释和结论完全是作者的观点。它们不一定代表世界银行重建与发展银行及其附属机构或其执行董事或他们代表各政府的观点。